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全唐五代詩

目次



全唐五代詩

目次

主編 周勛初 傅璇琮 郁賢皓 吳企明 佟培基
常務編委 孫方 楊軍 嚴杰 羅時進 吳河清 武秀成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陝西人民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人文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引言

這裏首列三篇文字，旨在說明《全唐五代詩》從醞釀到成書的過程。《御定〈全唐詩〉的疏誤與〈全唐五代詩〉的編纂》一文，從學術史的角度介紹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在此領域內進行的探討和積累。此文原是周勛初為參加第一屆「兩岸古籍整理研討會」而撰寫的，今移用於此，說明產生《全唐五代詩》的學術背景。《編纂說明》對成書的緣起和最終完成作了說明，此文由周勛初、傅璇琮、郁賢皓三人討論後寫定。《凡例》曾經過反復修改：蘇州大學唐詩研究室提出擬訂的初稿後，主編會議討論多次，委託陳尚君進行修訂，條理細密，為整理者提供工作準則。最後由南京大學《全唐五代詩》工作委員會再次修訂，精簡提煉，為讀者提供參考。

御定《全唐詩》的疏誤與《全唐五代詩》的編纂

唐代國勢極爲強盛，文化也極繁榮，尤以詩歌的成就爲高。清代初年，聖祖玄燁平定內亂外患之後，意欲追步唐太宗的盛業，遂對唐詩情有獨鍾〔一〕。他命曹寅徵集江浙兩省的在籍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利用胡震亨《唐音統籤》和季振宜《唐詩》的現有成果，略事加工，僅花了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編成《全唐詩》九百卷，以「御定」的名義頒行天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集部總集類五《御定〈全唐詩〉》提要譽之爲「自有總集以來，更無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這是臣下頌聖的門面話，自不足爲據。這樣的一部大書，僅花上這麼短的時間就告完成，則工作的草率，可想而知。但因其爲御定之書，臣下不敢多所議論，直至清廷搖搖欲墜之時，學界始見有批評的意見出現。

當代反響

其實曹寅在揚州設局組織人力編纂此書時，「全」書不「全」的問題即已暴露。當時著名學者朱彝尊正在揚州編纂《兩淮鹽筴志》，曹寅商請他覆核全書有無遺漏，朱彝尊遂開

具一份書單，供其參考，但因《全唐詩》急於進呈，匆忙完工，也就沒有根據書單中提供的材料多方訪求以作補充。朱氏書單及與曹寅書都沒有刻入《曝書亭集》。直到宣統元年清室垂亡，人們少有顧忌時，番禺沈宗琦才將《潛采堂書目》四種之一的《全唐詩未備書目》刻入《晨風閣叢書》。

朱彝尊《全唐詩未備書目》中列出了一百四十種左右的集子。馮登府跋《全唐詩未備書目》尚云：「（秀水朱彝尊）先生與曹通政寅書云：『曩承面諭補綴《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七冊孫元晏以下，至張元正共十四開，無考。今查出四十三人官爵，似宜注明。又李譚□六詩七首，又聯句三首，似宜補入。但業經進呈，成事不說，留此以見愚者千慮之一得耳。』」可見《全唐詩》中缺誤甚多，遠沒有官方宣稱的那麼完美。

本國學者中人不便議論此書，境外學者則無此束縛，相當於清高宗乾隆時，日本學者市河世寧利用彼邦文獻，如《千載佳句》與中土已佚的《文鏡秘府論》與《遊仙窟》等書，從中輯錄《全唐詩》中失收之詩，成《全唐詩逸》三卷，凡補完詩六十六首，缺文六首，詩句二百七十九題。作者共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二人不見《全唐詩》。此書約於仁宗嘉慶時傳入中國，鮑廷博將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這是第一次對《全唐詩》所做的補正工作。

《全唐詩》改編工作的醞釀時期

劉師培於光緒末年在日本撰《讀全唐詩發微》一文，對《全唐詩》中誤收和一詩兩見等問題進行抉發，指明其誤。如其中一條云：「張喬以進士隱九華，而喬有《省中偶作》詩，以馮唐自況，則此非喬作矣。」^{〔二〕}可知這是讀詩隨筆性質的文字，作者每取引而不發之勢，後人續作論證，則仍有開拓餘地。吳企明作《劉師培〈讀全唐詩發微〉權證》，續證之曰：「劉氏所論極是。《全唐詩》卷六三九載張喬《省中偶作》和卷六三八《秘書伴直》，都不是張喬詩。」理由是「張喬並未能及第而進入仕途，後隱於九華山」，並舉薛能《寄唁張喬喻坦之》詩為證，內有「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等句，則「張喬未入仕途明矣。」^{〔三〕}周勛初按：張喬厄於一第，康駟《劇談錄》卷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詩集類上《張喬集》二卷提要等文均有記載，可證劉氏所說可信。

《發微》此文章幅無多，並非經意之作，然作者學博才高，故其言頗多可採。

岑仲勉於一九三九年作《讀全唐詩劄記》，自云未見劉氏《發微》，但二人均承清代樸學餘波，故論證的方式類同。只是岑氏生活的年代要晚得多，其詩典章制度與金石版刻等有關學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岑氏又是這一方面的傑出學者，他利用這類知識考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劄記》題記自云：「斯篇之成，寧曰讀詩劄記，直作讀史劄記觀可

柱題名考》、《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唐方鎮年表》、《元和姓纂四校記》、《唐刺史考》等一系列典籍的出現，得益於唐誌者匪淺，而這些典籍之陸續問世，又促進了唐詩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大家知道，聞一多在唐詩研究領域內曾作出過傑出的貢獻。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剛到清華大學任教不久，曾在給友人饒孟侃的信中談及近年來從事的學術項目，共有八項，除了《詩經》《楚辭》兩項外，其他全涉及唐詩，計為：

《全唐詩校勘記》：校正原書的誤字。

《全唐詩補編》：收羅《全唐詩》所未收的唐詩。現已得詩一百餘首，殘句不計其數。

《全唐詩人小傳訂補》：《全唐詩》作家小傳最潦草。擬訂其偽誤，補其缺略。

《全唐詩人生卒年考》附《考證》。

《杜詩新注》。

《杜甫》（傳記）。

由此可見，聞一多的唐詩研究計劃甚為全面，而對校勘文字、輯錄佚詩與訂正小傳文字尤為致意，這也確是《全唐詩》中問題最多的地方。可惜由於時局的混亂和他本人的早逝，這些計劃大都未能實現。

聞氏歿後，留下遺稿甚多，而目下大家容易看到的，僅為收集在《聞一多全集》中的

《唐詩雜論》與《唐詩大系》兩種。《唐詩雜論》收集了他發表的一些論文，中除《賈島》一文外，其他八篇文章都是研究初盛唐時詩的。這一情況似乎表明聞氏的唐詩研究在他本人來說，尚屬起步階段。

但據前引聞氏研究計劃來看，他對《全唐詩》中的問題多方抉發，制訂有詳細的計劃，力求多方補正，這裏已有全面整理《全唐詩》的打算。

聞一多已不滿足於劉師培等人那種隨筆式的勘誤，而是企圖探討此書致誤的根源，尋找其內在規律，執簡馭繁，以便對《全唐詩》作徹底的清算。他曾撰有《〈全唐詩〉校讀法舉例》一文，說是「最好能尋出若干構成錯誤的公式來，憑着公式去檢驗全書，問題便容易解決得多了」〔七〕。可見他對御定《全唐詩》中問題的認識，要比劉、岑等人深入。

聞一多有關整理《全唐詩》的觀點和計劃，由他學生李嘉言繼承並加以開拓。聞氏《〈全唐詩〉校讀法舉例》中僅舉一例，即擬訂了一個勘誤的公式，云：「甲集附載乙詩，其題下的署名併入題中，因而誤為甲詩。」並舉韓愈、盧仝《月蝕》詩等例以明之。唐人編纂詩集時，除將唱和詩中的原唱收入外，例將和作亦行附入。後人不明這一體例，仍照後代文集的常見情況讀詩，也就容易把和作也視為詩集作者的作品了。這種情況很常見，聞氏的這一論述自然是有啓發性的。

李嘉言續作《〈全唐詩〉校讀法舉例》一文，將此公式擴充，又擬了七個公式，並各舉數

例以明之。這七個公式是：（一）甲集附載乙詩，其題下的署名遺漏，因而誤爲甲詩。（二）甲集裏的詩，其詩意與甲的行事不相合，則此詩往往爲乙詩誤入。（三）甲集裏的詩，其詩意與題意不相合，則此詩往往爲乙詩誤入。（四）多人同題，往往有誤。（五）同詩異題，致多重出。（六）形近而誤。（七）聲近而誤。可以看出，這是李氏在對《全唐詩》作全面考察之後得出的結論，說明學術界對《全唐詩》中存在的問題，已有既全面又系統的瞭解〔八〕。

學術界對有關《全唐詩》的認識不斷提高，條件日益成熟。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嘉言也就正式提出了《改編〈全唐詩〉草案》。此文文字無多，頗爲扼要，內分「校訂」、「整理」、「刪汰」、「補正」四大類。大類之下又分幾個部分，如「一、校訂類」內，又分作品重出、作品誤入、佚句、小傳、小注、樂府、無名氏作品、無考類、校勘誤字共九部分。每一部分之下有的尚分小類，如「（一）作品重出部分」之下又分五類：甲、重出互注例，乙、重出單注例，丙、重出無注例，丁、注云一作某詩而某集不載例，戊、注云一作某詩而無某集例。作者條分縷析，確把御定《全唐詩》中的問題抉發得差不多了。李氏並云：「全部計劃以校訂重出作品，考訂作者世次，詩集編年及補修小傳四項最爲重要。蓋此四項工作一旦完成，《全唐詩》即可作爲一部詳盡的唐詩史讀之矣。」〔九〕

李氏此文發表後，學術界反應頗爲強烈，隨後《光明日報》又刊登了王仲聞與丁力的

兩封來信，並以《對「改編全唐詩草案」的補充意見》為題發表，隨後又刊登了汪紹楹一文，標題同上。三人都對李嘉言的草案表示贊同，認為御定《全唐詩》中問題叢雜，實有改編的必要。王仲聞與汪紹楹是整理古籍的專家，他們都提出了一些可取的意見，如王氏建議於「草案（一）校訂類似可增加『出處部分』」。前後重出各詩「似宜臚列各種異文，作為新的校記，並注明所出，不要僅注『一作某某』」。汪氏則提醒改編者應當重視作為御定《全唐詩》源頭的胡震亨《唐音統籤》與季振宜《全唐詩》二書，因為：「兩家對於據本的來歷，異文的根據，逸篇的來源等等，大都注明出處，而現行《全唐詩》在纂修時，差不多完全刪掉，只存留一小部分。這對我們整理上是一個嚴重障礙。不過《統籤》和季書現在還在，在今天我們還能利用他來作為整理的基本資料。假如沒有這兩種書作參考，就不免要耗費不少時間人力，更何況有一部分資料，只能在這兩種書內尋覓呢？」（二〇）

李嘉言的這一計劃，得到了他所任職的學校開封師範學院的大力支持，為此還成立了一個「唐詩研究室」，配備人員，添置材料，積極開展工作。隨後「文化大革命」陡起，這項工作不久即告停頓。

「文化大革命」後唐詩研究領域中的新氣象

大陸地區的唐詩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後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大家對前此

階段研究工作中出現的弊病，那種主觀武斷、憑空立論、任意抑揚、倚勢壓人的惡劣風氣深惡痛絕，於是學術界普遍要求樹立一種新的風氣：語必徵實。於是岑仲勉等學者倡導的學風，重新得到重視。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唐詩研究方面積累了大量成果。御定《全唐詩》中存在的問題顯得愈發突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編寫《全唐詩》的呼聲又高漲起來。根據眼下的研究成果，大家覺得完全可以編出一部內容更爲豐富、材料更爲可靠、編纂更爲科學的總集。今人閱讀或研究作爲一代文學之盛的唐詩，不必再仰仗清代那本匆促編就的《全唐詩》了。

今從傳記、校勘、辨僞、輯佚四個方面分別作些介紹。

傳記

季振宜《唐詩》中的詩人小傳，大都採自現成的傳記，如兩《唐書》、兩《南唐書》、兩《五代史》及詩話、小說等，彙纂而成。胡震亨《唐音統籤》中的詩人小傳，取材較爲廣泛，除兩《唐書》外，還引用了很多雜史、筆記、地志、詩話與各家別集，並對這些材料有所考訂。他還採輯了許多詩人的遺聞逸事，附入小注，供學習時參考。胡氏引用的材料大都注明出處，其中好多文獻今已亡佚，因而彌足珍貴。御定《全唐詩》凡例之一曰：「詩前小傳，但略序其人歷官始末。至於生平大節，自有史傳，不必冗錄。」因此這些翰林僅在前人材料上大加刪節，而於事實的考訂與補充方面沒有作出多少成績。

御定《全唐詩》詩人小傳中間問題很多，岑仲勉即評曰「小傳疏舛」，亟應改寫。郁賢皓、陶敏於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即在《湘潭師院學報》與《南京師大學報》上連續發表《全唐詩作者小傳正補》三十餘則。

自一九八〇年傅璇琮在中華書局出版《唐代詩人叢考》之後，作家生平考訂之作層出不窮。傅氏此作共收二十七篇文章，考察初唐至中唐共三十二位詩人的生平和創作。這些詩人，過去一般稱之為中小作家，有的向來不受重視，傅氏以為研究唐詩必須考察清楚每一位詩人的生平，還應注意羣體的活動，因此對於揭示唐詩各個階段的文學集團和風格流派尤為致意。每立一說，必輯集豐富的資料，駁正舊說的迷誤，這在當時來說，確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

十多年來，考證唐代詩人生平的專題文字，盛況空前，如年譜、行年考、生卒年考、詩人行蹤考之類的文章，各種類型的報章雜誌上均有發表。很多詩人有好幾種考訂文字出現，例如有關盛唐詩人高適的年譜，除在「文革」之前即有王達津《詩人高適生平繫詩》^{〔一〕}、彭蘭《高適繫年考證》^{〔二〕}、孫欽善《高適年譜》^{〔三〕}、阮廷瑜《高適年譜》^{〔四〕}四種外，八十年代起又有周助初《高適年譜》^{〔五〕}、徐無聞《高適詩文繫年考》^{〔六〕}、譚優學《高適行年考》^{〔七〕}、劉開揚《高適年譜》^{〔八〕}等多種年譜出現。他如補訂、傳論之作尚不計在內。而如王維、岑參等人，也都有兩三種以上的年譜問世。至於涉及詩人生平考訂的單

篇文章，則很難統計，估計當在一千篇以上。

這些考訂文字中的上乘之作，對於詩人疑難問題的分析，可謂細入毫芒。浦江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花蕊夫人宮詞考證》^{〔一九〕}，以為《全唐詩》中繫於後蜀主孟昶妃名下的宮詞實為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此文因考辨精密而傳誦一時。可以說，這類文字目下已很常見。即如傅璇琮作《劉長卿事蹟考辨》^{〔二〇〕}，將史籍中含混不清的仕途沉浮細析為前後實兩次遭貶；又如陶敏作《陳陶考》^{〔二一〕}，以為晚唐五代時有兩位詩人均名陳陶，後人不明，故多異說。這些都是讀書有得之見，有助於重寫《全唐詩》詩人小傳者匪淺。

唐代詩人生平中的有些問題，已成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熱點，例如「文革」前稗山撰《李白兩入長安辨》^{〔二二〕}，隨之聚訟紛紜，產生了一次至四次說之間的紛爭。即在二次說中，也有各種不同意見出現。對於這一類問題，《文史知識》等雜誌經常組織專家寫作一些綜合報導，推動討論的深入發展。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主編的《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上，更多這類綜合報導。例如一九八四年《年鑒》上有郁賢皓《李白出生地》一文，一九八五年《年鑒》上有李田《李白〈清平樂〉詞三首真偽問題》一文，一九八七年《年鑒》上有郁賢皓《李白幾次到長安》討論綜述》一文，一九八七年《年鑒》上有薛天緯《李白家世問題討論綜述》、倪培翔《李白卒年研究綜述》二文，一九八八年有葛景春《李白詞真偽討論述評》一文，一九九一年有王輝斌《李白生平中十大熱點問題綜述》一文，這就把研究中出現的種

種分歧扼要地作了介紹，也是對前此階段研究工作的小結，有助於推動後一階段研究工作的開展。此外，每一期《年鑒》上「一年研究情況綜述」中還有「李白研究」專題，報導當前最新研究動態。一九八三年《年鑒》上還有王麗娜《美國對李白詩歌的翻譯與研究》專文，引進了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

御定《全唐詩》卷七六九至七八四，計十六卷，稱「無世次爵里可考者」，列三百三十一人，約占《全唐詩》所收人數的七分之一。按胡震亨《唐音統籤》已籤六中，有世次無考詩四卷，計一百三十六人，然均注明資料出處，御定《全唐詩》徑行刪去，更使這些文字難以考核。實則這些所謂「世次爵里無考者」中不少人還是可以考知的，張忱石作《全唐詩》「無世次」作者事蹟考索，或考其籍貫，或探其家世，或稽其生平，或求其歷官，或測其時代，鉤沉索隱，所得凡七十餘人^{〔三三〕}。佟培基作《全唐詩》無考卷考、《續考》，一考作者時代事蹟，二考詩之載籍出處，三辨作者及詩之重出，於七六九至七七三共五卷中考知一百〇九人^{〔三四〕}。這些研究成果都對改寫詩人的小傳大有裨益。

在這眾多的詩人考訂工作中，有兩部專著值得作些介紹。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總結了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共搜集編次他人與自己考出的人名達數千人次^{〔三五〕}。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的視野不囿於一家一集，既廣泛佔有資料，又窮究史源，而筆力所指，則集中攻治人物考證。因其方向明確，故所獲至豐，堪推為這一時期成

績最爲突出的一部著作^{〔二六〕}。

有關唐代詩人傳記的研究成果甚爲豐富，學術界乃進而對此作綜合的處理。周勛初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其中詩人部分達三千八百餘人^{〔二七〕}，比之御定《全唐詩》中的詩人二千五百七十六人^{〔二八〕}，超出一千多人，況且這些詩人大都經過考核，生平事蹟瞭解得更清楚了。

從《唐才子傳》一書的多次刊行新版中，也可看出唐代詩人生平考索的研究成果之豐富。按此書前後有王大安《唐才子傳（校訂）》^{〔二九〕}、舒寶璋《唐才子傳（校注）》^{〔三〇〕}、周本淳《唐才子傳校正》^{〔三一〕}、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三二〕}、孫映達《唐才子傳校注》^{〔三三〕}、李立樸《唐才子傳全譯》^{〔三四〕}等作。傅氏主編此書時，對書中的每一位詩人，約請專治其歷史的專家進行校箋，從而從整體上反映出了八十年代大陸地區攻治唐代詩人生平事蹟的學術水準。

校勘

季振宜《唐詩》和胡震亨《唐音統籤》二書都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改編《全唐詩》時，應當盡可能地採用二書成果，這已成爲學術界的共識。但隨之也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有人可能會起這樣的疑問：季、胡二書的完成，距今已有三四百年，那時保留的宋元古籍，現在已經遺佚的很多，況且季振宜爲清代前期的大藏書家，所謂遞修本《唐詩》又是承接錢謙益殘稿而來的，絳雲樓藏書富甲東南，季氏《唐詩》定然會有版本上的先天優勢。